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LIER YANJIU

李洱研究

王雨海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程光炜 吴圣刚 主编

李洱研究

王雨海 编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洱研究 / 王雨海编著. — 郑州 :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2

(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

ISBN 978 - 7 - 5649 - 1907 - 8

I. ①李… II. ①王… III. ①李洱 -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1988 号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版统筹 侯若愚

责任编辑 韩 琳

责任校对 舒慧敏

封面设计 侯一言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室
电 话 0371 - 60993151 (人文社科出版分社)
0371 - 86059753
网 址 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诚丰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5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原作家群资料整理”研究成果

本成果出版得到淮河文明研究中心资助

李洱研究

编选说明

从最初动议到确定方案,再到最后完成,这套“中原作家群研究资料丛刊”历时一年有余。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已有研究成果的简单整合。首先,编著者必须通读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包括文学作品、散文随笔、演讲报告、文艺批评等等,形成对作家作品的感性认识和理性判断,这是编选作家研究资料的基础和前提。然后收集研究资料,要求尽可能全面详尽,网络、期刊、报纸、杂志、著作、作家本人及其亲友、故交等各种途径、各种渠道,越全面越好。最耗时、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是资料的分类、甄别和遴选,它体现了编著者的眼光、立场、态度和学养,决定了研究资料的分量和品质。典型性、历史性、多元性是我们选文的基本原则,力求覆盖作家不同时段、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作品,兼顾专家批评和新锐批评,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生态和文化场域。总之,整个过程没有捷径可走,全是笨功夫、苦功夫。尽管如此,其疏漏之处肯定不少,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研究资料共分四大部分,即作家“自述·访谈·印象记”、“研究论文选辑”、“作品年表”、“研究资料索引”。“研究论文选辑”以时间为线索,以“问题”为中心,先总论、后分论,同一“问题”相对集中,体现逻辑性和层次感,并努力体现作家作品研究的历史进程。对入选的文章,为了出版方便,作统一技术处理,删减了摘要、关键词,注释一律改为脚注,除对一些明显的文字和标点符号的疏误作订正外,其他方面包括注释的不完整、不规范,词语使用的不当等,则依旧保持原貌。“作品年表”部分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整理收录,截止时间为2014年7月。只列入作品的首发、首印,作品的再版、转载不列入年表,海外翻译版本尽可能列入年表。期刊、著作均按年、月排序,报纸具体到日期。重要散文、发表的重要演讲等列入作品年表,但作家编辑的书目、研究资料等均不列入。“研究资料索引”包括单篇学术论文索引、学位论文索引、研究专著索引三部分,截止时间同样为2014年7月,均按刊发/出版时间先后顺序编排。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各种原因,编委会没能与选用论文的作者一一联系,丛书出版后,将赠书一本,以表歉意和谢意!且本书用于学术研究而非商业目的,想学界前辈、同人亦能理解支持。在此真诚致谢!如需稿费,请与编委会联系。

编委会

2014.10.31

总 序

程光炜 吴圣刚

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为多样、多态发展的趋势。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早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现象和重要构成。之所以称之为“文学豫军”或“中原作家群”,是因为它呈现出群体性,是一个集合的概念。但是,这绝不意味着这个群体中的个体是孱弱的,没有独立呈现的分量。相反,正是一个个有分量的个体组成了一个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姚雪垠、叶楠、白桦、李准、张一弓、南丁、田中禾、张宇、郑彦英、李佩甫、二月河、周同宾、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刘庆邦、李洱、柳建伟、孙方友、墨白、邵丽、乔叶、计文君等等,每位作家都有不凡的创作业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都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地处中原的河南,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版图上不是核心地带,但在历史、文化地理图上却是积淀深厚的重镇。这里也在接受全球化的荡涤,也在搭载现代化的快车,但这里与中国当下的经济前沿存在着距离,呈现着现代化的滞后性。因此,河南在时代的节奏中存在着“时间差”。这使得中州大地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还氤氲着农业文明、历史文化的气息,也使得中原儿女在这种相对的“慢节奏”中对历史、现实和文化进行思考,精神和灵魂回归这片土地,并以中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多种表达。走进历史,走进中原文化,是豫籍作家的共同选择。无论是身居河南的作家还是移居他乡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仍然栖居在家乡故土,并用他们敏感的触角细腻地联系和感受着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是他们精神发生的原点,河南历史和家乡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源泉。对于这些河南作家来说,似乎只有这片故土和其中的点点滴滴才能够激活创作的灵性。正如阎连科所说:“我家住在一个镇子上,那是一个很大的村庄。那个村庄是我写作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情感源泉、想象的源泉。一句话,是我写作的一切的灵感之源。那个镇子奇妙无比,任何现实中的一件事情都可能是荒诞的、合理的。”^①正是在这种表达中,作家们完成了自己的一部部皇皇巨著,成就了当代河南文学的气象大观。

^①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 <http://v.book.ifeng.com/book/ts/7332.htm>。

“中原作家群”不仅是河南的文学现象,也是全国的文学现象;产生于中原大地的河南文学,早已超越了这一区域空间。无论是二月河、李佩甫的作品红遍全国、传播域外,还是刘震云、阎连科、周大新、李洱的作品的海外影响,都说明豫籍作家的作品是全国性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分量。这足以构成河南自己的文学史。关于河南文学和“中原作家群”研究,近十年来,随着作家作品的动态性呈现,更多表现为个案化的文学研究,而当代河南文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则不够。这一方面与河南的经济实力及其对文化提升、带动能力的不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学界、文学界对河南文学在当下中国文化地理学上的地位认识不足有关,特别是与本土学界的研究、推介的成绩有关。弥补这一不足,是一项浩繁的工作,但起步必须从基础开始。

资料整理无疑是学术研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学术界目前关于河南作家的研究资料,主要是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准研究资料》、《姚雪垠研究资料》等有限的几种。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文学豫军”、“中原作家群”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阐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荪的《文学豫军论》等,该文系统性地评述了“文学豫军”的由来、构成及文化特征。二是“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以及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刘增杰主编的《精神中原》以论文集的形式综合了学界对于中原作家群整体把握和作家研究的成果;张鸿声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当代卷》则是系统描述当代河南文学发展的第一部史著;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以“外省”的视角考察河南文学,从文化的角度寻觅和审视河南文学;何弘的《超越还是重复——中原文学论稿》试图对“中原作家群”或中原文学作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些研究对于解说一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是必要的,但都是初步的,特别是对“中原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原因和整体性特征的研究,远未形成对“中原作家群”完整的、核心的解说,更没有评估、揭示出“中原作家群”的应有价值。因此,就需要有人真正深入下去,沉入到纷繁的资料中去,耐心、细密地梳理,把那些能够反映和体现作家创作实绩、作品价值和当代河南文学整体面貌的资料整理出来,形成完整、系统的当代河南文学的资料体系,为文学史的生成奠定坚实的基础。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的一些老师近年来致力于河南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方向和领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作为一所本土的有长期人文积淀的高校,研究河南文学、推动河南文学发展是应有的责任。2013年起,文学院整合文艺学、现当代文学和写作学等学科的十几位教授、博士组成研究团队,集中开展当代河南文学研究。这个团队以博士为主,中青年结合,队伍整齐,潜力很大。他们首先从资料整理开始,扎扎实实开展研究工作。第一辑选取“中原作家群”中影响最大的15位作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出《白桦研究》(陶广学讲师,

扬州大学博士)、《张一弓研究》(吕东亮副教授,武汉大学博士)、《田中禾研究》(徐洪军讲师,上海大学博士)、《张宇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李佩甫研究》(樊会芹讲师,江苏师范大学硕士)、《二月河研究》(吴圣刚教授)、《刘震云研究》(禹权恒讲师,武汉大学博士)、《阎连科研究》(方志红副教授,四川大学博士)、《周大新研究》(沈文慧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刘庆邦研究》(杜昆讲师,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李洱研究》(王雨海教授)、《墨白研究》(杨文臣讲师,山东大学博士)、《邵丽、乔叶、计文君研究》(李群副教授,河南大学硕士)等13卷,资料选编力求翔实、准确、有代表性。第一辑告罄之后还会启动第二辑,甚至第三辑,目标是把“中原作家群”主要作家的资料完整、系统地拓展出来,真正为当代河南文学的深化研究做些基础性的工作。

由于编选者的眼界、学识、水平有限,疏漏、不足,甚至差错定然存在,敬请学界批评指正。

目 录

1 编选说明

1 程光炜 吴圣刚 总序

自述·访谈·印象记

3 李 洱 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自述

4 李 洱 小说家的道德承诺

7 李 洱 传媒时代小说何为?

12 李 洱 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

20 李 洱 梁 鸿 “日常生活”的诗学命名与建构

44 李 洱 梁 鸿 虚无与怀疑语境下的小说之变

61 李 洱 梁 鸿 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叙事

81 李 洱 周 洁 没有小说,世界会很枯燥——与著名作家李洱的对话

85 李 洱 马 季 探究知识分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

94 魏天真 李 洱 “倾听到世界的心跳”——李洱访谈录

105 刘 洋 “乡村中国”是中国文化的根基——对话著名作家莫言、李洱

109 朱 竞 河南人李洱

111 张 宇 李洱的光芒

113 吴虹飞 李洱:作家嘴里开花腔

研究论文选辑

123 南 帆 饶舌与缄默:生活在自身之外

129 陈晓明 历史在别处

131 格 非 记忆与对话——李洱小说解读

137 王鸿生 被卷入日常存在——李洱小说论

143 张学昕 话语生活中的真相——李洱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

152 魏天真 饶舌的哑巴:怀疑主义者的青春期话语——李洱早期小说文体风格

- 164 王宏图 李洱论
- 178 [韩]朴宰雨 崔强(译) 先锋性的探索——超俗不凡的智略型作家李洱
- 182 张旭东 论李洱小说的“知识分子书写”
- 191 田中禾 葛笋搭成的白塔
- 194 吴义勤 “谋杀”的合法性——评李洱的长篇小说《花腔》
- 196 李庚香 文化视野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建构——对李洱《花腔》的文化批评
- 207 敬文东 历史以及历史的花腔化——论李洱的《花腔》
- 229 李迎丰 国际化语境中的知识悲剧——李洱小说《花腔》中话语结构的比较文学阐释
- 239 刘思谦 “村委直选”与乡土中国——李洱长篇小说《花腔》到《石榴树上结樱桃》阅读随笔
- 249 徐德明 《石榴树上结樱桃》:叙述和隐喻之间的对位与张力
- 258 梁 鸿 “灵光”消逝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乡土文学的美学裂变

作品年表

- 271 李洱作品年表

研究资料索引

- 279 李洱研究资料索引
- 299 编后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自述 · 访谈 · 印象记

一个怀疑主义者的自述

李 洱

我出书很少,只有几本薄薄的集子和两部长篇小说。同辈作家大都“著作等腰”了,我却是“著作等脚”。这倒不是因为手懒。吃的就是这碗饭,手懒不是找死吗?说来说去还是因为个人的脾性。

在日常生活中我特别容易轻信,很容易上当,但在写作上我却很少轻信。阎连科先生曾建议我出文集的时候,在文集的封面上标明,这是“一个怀疑主义者的文集”。打个比方,日常生活中有人告诉我公鸡会下蛋,我肯定会说,对,会下蛋,运气好了还会下个双黄蛋。但同样的事情放到小说里,我就要怀疑了。不光公鸡下蛋要怀疑,连母鸡下蛋也要怀疑了。母鸡下蛋?难道是只母鸡都会下蛋,都必须下蛋吗?既然上帝允许有些女人不生孩子,为什么不允许有些母鸡不下蛋呢?具体到某篇小说,即便已经写了一多半,即便已经画上了句号,我还是会怀疑: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意思?故事中的那个家伙真的值得一写吗?这个故事到底有没有人写过?中国人没写过,外国人也没写过吗?你看到了吧,别人是“下笔如有神”,我呢,好像“下笔如有神”,其实“下笔如有鬼”,所谓疑神疑鬼是也。你说,这种情形下,我怎么能够“著作等腰”呢?

但我毕竟还是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尽管怀疑主义情绪如同迷雾一般无处不在,但我每天还是要在那迷雾中穿行。帕斯捷尔纳克说:“我写作,因为我有话要说。”他讲得真好。“有话要说”这个伟大的动机,几乎会在每个作家的写字台前闪光。但对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要说出自己的话,以自己的方式说出自己要说的话。这很难啊,它需要激情、勇气和学识,也需要作家在想象力、表现力和认知力方面进行严格的自我训练。拦路虎很多啊,每一只拦路虎都可能把你吃掉,吃了以后人家吐不吐骨头你都不会知道。但我还是写下了这么多作品。在午后时分,如果那迷雾尚未散去,它就会延续到深夜甚至黎明。时光漫长,与其等着给拦路虎吃掉,还不如趁着大雾弥漫穿越密林。如果能够侥幸逃生,那当然很好;如果无法逃生,我毕竟也做过逃生的努力,这总比坐以待毙要好一些吧?

所以,我还在写。

小说家的道德承诺

李 洱

没想到,这本书我竟然读了两个星期。台湾作家中,张大春和朱天文的小说,凡是能看到的,我都要细嚼慢咽。因历史之思和家国之思而产生的疼痛感,对汉语小说所做出的智性表达,在张大春和朱天文那里是合二为一的,所谓道器并重。朱天文谈创作的文章,我只在《今天》杂志上读到这一篇关于电影的文字,很喜欢。这次读张大春的《小说稗类》,就不仅是喜欢了,应该说喜欢而且佩服。既能写小说又能论小说,舍得说,并且能够说到点子上的,确实没有几个人。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当然是此中高手,但他们往往过于炫技,甚至夸大其辞。米兰·昆德拉算一个,但此人有些心术不正,他热衷于表扬二流作家,对一流的小说家却大加鞭挞。近年大陆文坛也不乏大内高手,比如王安忆和格非。但这二位最喜欢分析的却是当代外国小说。而张大春先生,却是古今中外通吃,并且洞见迭出如同蜂房,我自己也从中得到很多启示。

撇开追名逐利的因素,其实每个作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写作”。“除了写作我什么都不会”,此类回答,我们听到的最多。俏皮倒是俏皮,但其实是敷衍之辞。前段时间重读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与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思的对话,伊凡·克里玛对这个问题的问答真是深得我心。他说,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有才华的人将写作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伊凡·克里玛其实道出了在极权专制以及随后到来的个人性普遍丧失的商业社会里,写作得以存在的理由。张大春先生在《小说稗类》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他认为小说是一股“冒犯的力量”,小说“在冒犯了正确知识、正统知识、真实知识的同时以及之后,小说还可能冒犯道德、人伦、风俗、礼教、正义、政治、法律”,正因为这种冒犯,小说一直在探索尚未被人类意识到的“人类自己的界限”。在谈论意大利作家艾柯的《玫瑰之名》(顺便说一句,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小说题目之一)的时候,张大春对此另有总结,认为小说是在探索“被禁止的知识”。无论是伊凡·克里玛还是张大春,他们的谈论其实闪烁着一种“道德承诺”的光芒。当然,那是基于小说写作的道德承诺。

当然认真地追问这个问题,仍然可以给人带来困惑。虽然米沃什曾说过,对于写作者来说,20 世纪的历史我们还几乎没有动过。这是谴责,期盼,也是无

奈的哀叹。而对遗忘的反抗,写作者尤其大陆的写作者可能会比张大春先生有更强烈的动机。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提到,当写作者当下的文化处境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以后,“知识的禁忌”在文化记忆尚未丧失之时可能已经被迫贬值,小说作为一种“冒犯的力量”,它所冒犯的对象可能已经随之产生位移,并取消你的行动的意义。是的,一切仿佛都在改变,用迪伦马特的话说,祖国变成了国家,民族变成了群众,祖国之爱变成了对公司的忠诚。与此相适应,曾经被禁忌的知识,或许会显示出新的价值。我相信,这是写作者面临的最根本的困惑之一。春江水暖鸭先知,身处海峡对岸的张大春先生,可能会比我们更早地面临着这样一个疑问。我注意到张大春先生提到他非常看重索尔·贝娄,看重他的《雨王亨德森》(内地译为《雨王汉德森》)。碰巧,这也是我热爱的作家和作品。索尔·贝娄曾经无可奈何地表示,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将被抛到脑后,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人文学科将应召为地下墓穴挑选墙纸。听起来就足以让人汗毛倒竖!但他确实道出了部分实情。无疑,写作的意义,小说的意义,需要重新评估。张大春从最早的庄子的寓言故事,说到司马迁的《史记》,再说到艾柯和卡尔维诺(这二位也碰巧是我喜欢的作家),小说随着斗转星移而历经种种演变,从中我们或可得到某种启示,以便重新找到小说叙事的动力?

这本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张大春对具体的小说写作技巧问题的阐述,即张大春的小说修辞学。读到他关于小说语言的一段文字,我差点站了起来。因为在七八年前的一段文章里,我也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篇短文是发表在《青年文学》杂志上的。现在读到类似的论述,我可谓遇到了知音。没错,当代小说家最重要的修辞学,就是清理和检验那些“语言的尸体”。这些尸体像粪便一样从播音员漂亮的嘴巴里喷出,它们散落在各种报纸的头条,严重地污染着人们的感官。我被张大春先生的议论完全吸引,是在读到张大春对那个有名的“公案”的分析之后,我说的“公案”是指鲁迅《秋夜》的开头:“在我的后院,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惜墨如金的鲁迅为什么不直接说“有两株枣树”,而要说“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我在高校教书时,也曾向学生分析过这个公案,我是从“形式的写意”上分析的。现在看了张大春的分析,我顿觉自己的分析有些勉强。张大春注意到了句子中的“可以看见”四个字,即鲁迅是“为读者安顿一种缓慢的观察情景”,为的是引领读者接下来仰起脖子,好观察枣树上方那“奇怪而高”的天空。由此我想起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开头,海明威用“望得见”一词为读者安顿了一个观察视角,让读者去看河心的那些大圆石头。类似的例子还有《百年孤独》的开头,作者引领读者看的也是河心的那些石头,它们宛如史前动物留下的蛋。看来,如此的开头,实为引领读者从现实世界进入文学世界的便捷小径。张大春

书中类似的分析不胜枚举。如果你碰巧遇到他在分析一篇你熟知的小说,譬如乔伊斯的《逝者》(内地译为《死者》),譬如艾柯的《傅科摆》,你都会发现张大春可能有更深入的读解。如果说有什么不足,我想张大春在分析具体文本的时候,其实可以更多地联系到当代生活经验。因为对任何文本的解读,都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用当代生活经验去理解小说家所呈现出来的经验。

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是,张大春对“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关注。就我所知,大陆的耿占春先生对此也有精妙的分析,耿占春在关于我的小说《花腔》的一篇论文中,就曾指认《花腔》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耿占春和张大春都引用了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的一段话:“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张大春说,这种小说“毕集雄辩、低吟、谚语、谎言于一炉而冶之,如一部‘开放式的百科全书’”。我想,这种小说部分地偏离以讲述“个人经验”为主旨的“说书传统”,为的是激活并重建小说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类型的小说,当然因为小说家对已有的历史范畴和观念产生了怀疑,对“说书传统”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可能是,它要表明小说家对单一的话语的世界的不满和拒绝。小说家在寻求对话,寻求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对话。

我得承认,我在阅读《小说稗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我与张大春先生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写作的语境的不同。对张大春先生自诩的“工匠精神”以及他对写下了《动物庄园》的奥威尔的不认同,我可能另有看法。张大春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奥威尔的小说有某种“恶劣影响”,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读物”。不能因为书中“看不见少女和她盛满水的水罐”,就断定这部小说没有“窗子”。其实,奥威尔的小说也是庄子所说的“厄言”,是“酒杯中的水”,它也是庄子笔下的“罔两”所说的“蝉蜕的壳,蛇蜕的皮”。在张大春先生渐渐陌生的语境中,那种小说可能是真正的屡遭铲除的“小说稗类”。而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得承认,我对张大春先生所身处的具体语境确实有某种钦慕。我想,如果我处于那样的语境中,我或许也会作出类似的判断,但我现在不会。我想,这也是小说家的道德承诺,是张大春先生可能已经淡忘的小说家的一种“伦理的律令”。对小说家来说,或许更紧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带着这种“道德承诺”,这样一种“伦理律令”,站在一切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各种知识展开对话。

对一本书的阅读,是对作者的尊重,也可能是对作者的偏离。因为这是一本值得小说家和读者阅读的书,我想我或许能看到更多有价值的讨论。

原载《文艺报》2004年10月12日